目　录

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

……四川大学历史系（1）

一、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川北的社会政治经济概况……（1）

二、红四方面军的入川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……（21）

三、粉碎四川军阀的围攻……（40）

四、土地革命和肃反……（75）

五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……（91）

六、宣传工作和文教卫生事业……（108）

七、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根据地人民坚持革命斗争……（119）

川陕革命根据地大事月表

……四川大学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（138）

川东游击军的斗争……王维舟（173）

红军在广元……广元县文物管理所（181）

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概述

……四川大学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（193）

附　录　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十九辑勘误表……（211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

四川大学历史系

一、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川北的社会政治经济概况

（一）自然环境和社会概况

川陕革命根据地位于秦岭和大巴山山麓，它的大部份地区在川北，计有通江、南江、巴中、万源、平昌、宣汉、达县、开江、渠县、大竹（以上各县现属达县专区）、苍溪、阆中、南部、仪陇、蓬安、营山（以上各县现属南充专区）、旺苍、广元、昭化、剑阁（以上各县现属绵阳专区）等廿县，川东有城口、开县、梁平（以上各县现属万县专区）等三县。在陕南有宁强、西乡和镇巴三县。幅员辽阔，纵横四、五百里，人口五百万，面积约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。其中通江、南江、巴中、万源、平昌、旺苍、城口七个整县和阆中、仪陇、宣汉、广元、昭化的大部份，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。其他各县为游击区。

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内，巴山支脉纵贯全境，构成有名的大巴山区，特别是其北部，更是崇山峻岭，地势险要。通江、南江境内大山绵亘，海拔800—2,000公尺。巴中稍稍低平一些，但一般也海拔360—1,200公尺。这里的气候，在北部大山老林地区变化较大，冬季积雪半年不化，夏季则常受冰雹侵害，此外还有风、

虫、水、旱、冻等自然灾害。

大山老林地区是人多田少，坡陡土薄，气候寒冷，平均积雪期为五个月，所以农作物的生长较慢，主要生产包谷，洋芋等。这些地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矿藏，据统计有铁、煤、铜、锡、铅、铝、锌、磷、金、银、石棉、云母、玉石、水晶石、冰洲石、耐火石、石灰石、滑石等四百多种。土特产有茶叶、银耳、黑耳、生漆、桐油、药材、蜡虫、野兽等，并且还是宜林宜牧，出产牛羊的好地方。在南部地势较平的山区和丘陵地带，则宜农宜牧，水田较多，主产水稻、小麦，其次是红苕、包谷、棉花、洋芋及各种豆类、瓜类，还有蚕桑果树。猪、羊、鸡等家禽也很发达①。

这里的人民是勤劳勇敢的，他们向自然界展开了顽强的斗争，甚至在60—70度左右的巴山坡上亦垒起了石块，开辟出层层梯田，他们还得经常与野兽斗争，有一首民歌这样唱着："高高山上没搞头，又出野猪又出猴，要想夫妻同床睡，除非包谷收上楼"。每当播种和收获的季节，农民便在地旁搭起棚子，升起烟火，日夜防守，使庄稼不遭兽害，甚至还有用绳索吊到猴子不能攀缘的地方去下种。贫苦农民缺乏耕牛，他们就用人力来进行耕种。不仅男子参加生产，妇女们也参加生产，不少妇女甚至是主要劳动力，通江就有"要吃通江饭，妇女打前战"的谚语。

在根据地中心地区，通、南、巴三县由于大山绵亘，交通比较闭塞，陆路只有供人畜行走崎岖不平的土路、山路和石块路，没有公路也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。在水路方面，巴河、通江河和南江河通行木船、木筏，以巴中为中心，沿巴河上溯，可达南

① 《关于老根据地工作概况的报告》，1956年9月8日。

江，向东南经斯滩河（在平昌县内）可达通江，但由于上游滩多水急，航行不便，有的地方一年只能航行数月，因而运输多靠人力背运。由于交通不便，丰富的物产不能大量外运，而本地急需的生活用品如盐、布及其他工业品也不能及时大量地输入，人民生活是极其困苦的。

虽然有着富饶的资源，但在军阀、豪绅、地主的统治下除了忙于混战和剥削人民外是不会也不可能来开发的。在他们的统治下，关卡林立，苛税繁重、货币紊乱，人民购买力十分低下，工商业极不发达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。工业中仅有一些家庭手工业和小手工业作坊，如用土法开采和冶炼生铁，制造锅、陶器以及织布、染布、榨油、编制草帽、席子等，其中以土布生产较多。商业方面，仅限于土特产和日用品的供销；商业经营以本地的小商贩为主，贩卖广大人民的生活用品如油、盐、布、酒等。较为大宗的贸易，则多为外地商人经营（以渠县、南部、营山、汉中、合川等地为多），他们将本地药材、银耳、黑耳、生漆、桐油、茶叶、皮毛、猪鬃、蜂糖和兽骨等运往重庆、合川、汉中等地，将食盐、糖、布、绸缎、香烟、药品、烧酒及其它日用品输入。通江、涪阳因是生产银耳之地，外地商人云集于此，场镇比较热闹，有“小上海”之称。

在军阀的残酷统治下，川北地区的文教卫生事业也是非常落后的。例如，一九三二年以前，通江、南江两县不仅没有一所中学，就连设备较为完善的小学也为数很少，一般都是私塾，且为地主阶级所把持。因此，识字的人极少，文盲在90%以上。医药卫生条件更差，每逢春秋雨季前后，则伤寒、痢疾、天花、时瘟等疾病流行，死亡率很高。此外，在这些地区还流行着花柳和麻

疯等病，军阀官僚们为了搜括民脂民膏，又强迫人民大量种植鸦片，以收重税，其结果不仅是粮食的减产，而且对人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。

综上所述，可以看到川北地区幅员辽阔，物产富饶，宜农、宜林、宜牧，人民勤劳勇敢，但在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统治之下，这里却变成了贫瘠、落后和痛苦的地区，广大的劳动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，终年吃杂粮野菜以度日，稍遇灾害，便造成严重的饥荒，这里有一首民歌描写了他们痛苦的生活：

尖尖山，二斗坪，
包谷红苕胀死人。
弯弯路，密密林，
茅草棚棚芭芭门，
想吃干饭万不能。

但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屈服，他们一直勇敢地同自然界，同阶级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，用自己的智慧和血汗创造了光辉的历史。

（二）军阀豪绅地主的罪恶统治

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，中国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地主阶级的统治，所不同的是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。但在一九三五年以前，四川依然是一个地方军阀林立的地区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还未直接控制。在红军入川前，各派军阀盘踞着大小不等的地盘，如刘湘占有川东及重庆一带，刘文辉占有川西及西康一带，邓锡侯占有川西北一带。在川北，当时为田颂尧、刘存厚、杨森等三个军阀所分割。田颂尧占有通江、南江、巴中、三台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仪陇、射洪、南部和盐亭等地，势力比较强大。刘存厚占有万源、宣汉和绥定（即达县）等地。杨森占有营山、渠县、广安和岳池等地。

各派军阀之间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，矛盾重重，连年发生混战。一九二八年，杨森部师长郭汝栋联合范绍增、赖心辉等军阀武装倒杨，激战于川东各县，杨森在罗泽洲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，霸占了下川东一带，势力日渐扩张，与控制着长江航运，盘踞在重庆一带的刘湘矛盾尖锐起来。杨森在桂系军阀的支持下，纠集了邓锡侯、田颂尧、赖心辉等，组织所谓“国民革命四川同盟军”，而刘湘则联合刘文辉组织联盟以对抗。于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江北、江津一带爆发了“下东之战”，到一九二九年以刘湘获胜而结束。这次混战，对刘湘势力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巩固的基础。由于控制了长江航运，使他与蒋介石及美、英、德等帝国主义的勾结更为密切，又便利了他对其他军阀在经济上进行扼制，这样一来便与实力比较雄厚的刘文辉发生了矛盾。一九三二年九月，这两个四川最大的军阀，便爆发了争霸四川的战争。其他的军阀如田颂尧、邓锡侯、杨森、刘存厚等，也因利害关系与刘湘联合起来。刘湘还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与美、英等帝国主义在枪支、弹药、飞机和大炮方面的援助，这样无论在声势上，军队的数量和武器的装备上，都优于刘文辉。一九三三年八月，二刘之战以刘文辉败退西康，电请停战而告终。这次战争的规模和残酷都是前所未有的，对四川的破坏，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危害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。

据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不完全统计，四川军阀的混战达到四七〇多次，平均每月有战祸两次，这些战争不仅大量地吞噬了人民的生命财产，而且大大的破坏了社会生产，使四川人民陷

入水深火热之中。

在军阀、官僚和豪绅地主统治下，人民在政治上毫无权利，处处受反动阶级的迫害，在经济上则受到日益加重的残酷地剥削。在各军阀防区内都实行了田赋的“预征制”，一年数征，且次数逐年增加，如田颂尧防区内由初期的一年三征激增到一九三一年的一年十四征。邓锡侯的防区内，在一九三一年已预征到民国五十年（即一九六一年）①。

在四川，除田赋外各种苛捐杂税亦是军阀收入的主要来源。据统计，当时全川就达七〇多种，而田颂尧统治的地区，苛捐杂税名目之多，勒索之重，更是骇人听闻的。

通、南、巴地区的人民还苦于军阀官僚政府的特别捐（军阀强迫人民大量种植鸦片以收重税）。当时巴中每年要缴特别捐一百万两，通江七十万两，南江三十万两。② 这种特别捐成了当时通、南、巴人民最沉重的负担。农民交不起捐税而被吊打时，还有吊费、打费。再加上官吏的贪污，层层加码，月月摊派，摊到人民身上的捐税就更为繁重。人民即使倾家荡产也无法承担，在巴中流行这样一副对联，写出农民愤怒的心情：

“好的他田家，苦了我田家③，说声派杂税，团总派、甲长派、估派滥派，指名官派，胡派鬼派，硬起心肠由你派。

为了要‘巴土’④，所以要‘巴士’，讲到收洋钱，场上收、乡下收、明收暗收，不怕手收，只怕关收，谨防尸骨无人收。”

穷苦人民缴不起捐税，军阀官僚便使用残酷的暴力来征收

① 《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》，第3辑。

② “访巴中政协副主席叶良盖记录”，叶曾任伪旅长。

③ “田家”前者指田颂尧，后者指农民。

④ “巴土”前者指巴中出产的鸦片烟土，后者指巴中的土地。

（对缴不起捐税的农民，动辄拴、打、吊、押、或关监牢，被整成残废或被整死的人是数不胜数的），甚至强迫人民卖儿鬻女来缴纳捐税。如南江县，在一九三二年筹集军款，数目达到了历年来的最高峰，人民无法缴出。伪县长姚垒却出告示说："杀人可恕，欠款难容"。公然叫团总、保长屠杀缴不出款项和反抗的人，在南江长池的街上"经常吊起排排的人"。①

田颂尧部旅长邢季卿，一九三〇年驻扎巴中时，他不顾当年收成不好，人民生活已极端痛苦，除照旧搜刮八万多元特别捐以外，"复估着民众于腊月内缴齐开拔费四万元。年关在迩，人民经济十分困难，……邢旅长……派兵下乡，肆意吊打锁押，逼着腊月内缴清，……巴中人民处此暴君铁蹄之下，只有当尽卖尽，缴纳苛捐而已"。②

通江也是如此。田颂尧部刘连长驻扎泥溪乡，连最穷的农民一年也要派两次款，每次一、二十块大洋，"缴不起的就吊打，并派人把穷人的猪、羊、牛及一切用具都抢光，人被吊打至死的很多"。③

除了苛捐杂税外，四川军阀为了垄断自己防区的金融事业，还私铸货币。"在每个防区以内有特殊的货币，普通多是'自己的银行'的钞票，除了钞票而外，便是银元，只有'袁头'才能通用各地"④"货币的使用也非常微妙，即使同一成区，相距几十里使用

① "访陈孝富记录"，陈曾任红军中央警卫营警卫员，现为南江长江公社监委主任。

② 《西南评论》，创刊号，1930年3月。

③ "访周绍治记录"，周曾任赤北县第一区第一乡苏维埃主席，现在通江池北公社。

④ 《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》，第三辑，149页。

的都不同。”① 货币到另一区去只有比原价降低几成才能使用，而且来往兑换也很麻烦。货币的紊乱，不仅有助于军阀对人民的搜刮，而且亦严重的影响了各地之间的物资交流和工商业的发展。

除了军阀及反动派政府对川北地区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榨外，封建地主，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亦是有加无已。关于一九三二年以前川北地区的阶级状况和土地占有状况，虽然没有一个比较全面具体和可靠的统计材料。但据访问调查和解放后土改中的材料来看，与全国一样，人口很少的地主阶级，占有广大的土地，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雇农却只有极少的土地。

在通江，以永安乡的德汉城为例，在一九三三年以前，共有土地一千七百多背②（五背为一亩，共合三百四十多亩）其中邓家富绅占九百多背，其他地主占四百多背，他们（指德汉城七户地主）占总数的76.8%。③又通江草池一个村，地主只占人口的20%，但占有全村的70%的土地。农民虽占人口70—75%，但却只占20%的土地。④

在南江，以玉堂乡为例，地主占人口的3.7%，而平均每人有十六点零五背土地，富农占人口的3.5%，平均每人九点六背，中农占人口34.6%，平均每人占三点七六背，贫民占人口51.5%，平均每人占二点四背，雇农占人口2.7%，平均每人占零点一七

① 《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》，第三辑，149页。

② 背是通南巴地区当时对毛谷子的计量单位，大背为二斗毛谷子，小背为一斗半，每斗毛谷子三十五斤。

③ 西师所作“通江永安乡典型调查综合材料”。

④ “访通江草池公社黄昭应记录”。黄曾任赤卫军营长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背。①

在巴中，以恩阳区旱谷乡东园社为例，红军来前，有四十七户人，共有土地六百一十四亩。其中地主六户，但却占有64.25%的土地，富农一户，占有8.56%的土地，自耕农二十五户，占有27.19%的土地，无地农民十五户。② 又如巴中花丛乡，地主九十二户，占有土地一万七千二百零七挑（一挑为一百斤），平均每人三十二点一挑，富农六十九户，占土地五千六百六十九点五挑，平均每人十一点九挑，中农五百二十四户，占地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七点五挑，平均每人六点一挑，贫农七百九十四户，占地三千八百一十九挑，平均每人零点九挑，雇农七十户，占地三十八挑，平均每人零点五四挑。③

川北一带的地租一般是实物地租，有对分，四六分，三七分，二八分和“铁板租”。一般的都是四六分和三七分，即地主占收获物的六成至七成，农民占四成或三成。农民向地主租地，首先要交押佃钱（押金），押佃钱交得多的，可以对分或四六分，否则就是三七分或二八分。旱地也要分，但要看具体作物，如棉花，地主收七成，黄豆、包谷、芝麻、绿豆等，地主通常收三成，一般说，红苕是不分的。农民终年辛勤劳动，往往就是这点杂粮。虽然一般地租是四六分或三七分，但实际上农民常常得不到四成或三成，因为大部分农民要偿还借款的利钱，扣除借来的谷种和应付地主对农民的一切超经济勒索。至于“铁板租”，则不管收成的好坏，一律要按数缴上，遇到坏年成，地主就拿农民

① 达县地委档案有关南江土地情况。

② 西师所作“巴中恩阳旱谷乡典型材料统计表”。

③ 达县地委档案有关南江土地情况。

家里的东西去抵租子。另外地主经常要加押钱，农民交不起的，地主则以“起佃”来威胁，结果农民只有卖猪卖耕牛或借贷以交押钱，常常逼得农民离开土地。

伴随着严重的苛捐杂税和地租剥削而来的是高利贷的猖獗。农民在无法交纳捐税、押金时，在青黄不接或苦于吊打时，只有向高利贷者去借贷。借贷有两种形式：一是“放粮”，一是“放钱”。放粮的利息一般是三至五分利，即借一斗谷子，秋收时还三至五升利，但高利贷者认涨不认跌，收钱不收谷，借时按谷子的最高价钱以谷付给，还时，虽然谷子便宜了但仍按最高价格以钱收进，结果虽是三至五分利，但春天借一斗，秋后往往要还三斗。至于“放钱”，有场息、月息和年息三种。一般利率是一至五分。“觔斗利”的场息是高利贷中最厉害的一种，借十元，一场（三天）后就要还二十元。“月百钱”是一分的月息，借一吊钱，月后还一吊另一百钱。“本月钱”在高利贷中要算是比较轻的一种了，利息通常是三分六，借十元，一年的利息是三元六角。还有所谓“先追利”的剥削，如借十元先扣二元利息，实借只有八关镇农元。农民一旦陷入高利贷的火坑就很难爬起来，如通江城民陈昌德，家有三十几背田地，三间房子，因无钱缴粮缴款，向高利贷者以“觔斗利”借了五元，一场后就要还十元，利上加利，经过了二十天，就把三十几背田地和三间房子全部滚走了，地主只留给他一个沙罐，把全家撵出去当了叫化子。①

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压榨也很厉害，农民种了地主的土地，除了交租外，每逢年节或地主有婚丧大事，就要送礼。如巴中清

① “访巴中渔溪公社社员唐月芳记录”，唐系红属。

江的某些地主，过年时就把农民送来的大块肉挂在正房，把小块肉挂在厢边，以示区别对待，送小块肉的就有“起佃”的危险。地主下乡上街时，佃户要给他抬滑竿，并以大鱼大肉来招待他。至于给地主挑水、砍柴、做零活更是经常的事，而且毫无报酬。地主对农民有很大的权威，可任意惩罚、吊打，甚至掌握着生死大权。死于地主毒打和折磨下的人是无法统计的。巴中渔溪乡唐月芳的孩子到树林里打松果，地主说“碰”了他的祖坟，动了风水，罚他们全家去后山修大路，还罚了十斗谷子，八块银元，才算了事。①

军阀的不断扩军，人民还要遭受抽丁拉夫的痛苦。一般说，一户之中三丁抽一，五丁抽二，没钱送包袱（贿赂），独生子也抽。团总、保长、排首等又乘机大肆敲诈，因为拉壮丁而整得家破人亡的事举目皆是。平时在田里、在路上，团总、保甲、狗腿子也是见人就拉，拉不到的就用枪打，整得人民白天不敢出门，晚上不敢睡在家里，更不敢上街赶场，有的人甚至忍痛砍断自己的手指以避拉丁，有的则逃亡外乡。至于拉夫去给军队修路，背运物资更是常事。

土匪的猖獗，也是军阀、官僚、地主统治下的必然产物。那时，川北一带大小土匪多如牛毛，往往农民赶场后提着东西回家时，在路上就被抢劫。其中最大的匪患是王三春，盘踞在南江的贵民区，当时人民称为“鬼门关”。他们经常骚扰各地，抢劫、屠杀，无恶不作，人民称之为“垮裤队”，“拉牛队”。此外，军队和团练的横行也是人民灾难之一，川北有这样一句谚语：“匪如梳，兵如篦，团练犹如刀刀剃”。

① “访巴中渔溪公社社员唐月芳记录”。唐系红属。

农民受不了军阀、官僚、地主的剥削压迫，不少人逃往外地，到处都是“房屋无人住，田地无人耕之凄寥景象”。① 留下的农民也不愿为地主干活，有些地方“三月清明不犁田，扯了谷桩栽现眼”。再加之以一般农民耕牛、农具、肥料都非常缺乏。因此，农作物产量很低。就是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巴中恩阳地区，谷子一般亩产二、三百斤、麦子亩产九十斤左右，棉花亩产只有十几斤。②

军阀官僚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也严重地破坏了川北地区农业生产。当时四川是全国产鸦片最多的地方，以最低限度的估计，一九三二年产量在四万万两以上，“以每亩产烟五十两计，则川省鸦片田约为八百万亩。”③ 而通、南、巴又是四川（除原西康地区）种植鸦片最多最集中的地方，据估计，烟田约占土地面积的30%～40%，④ 并且都是好田好地。烟田的增多，必然减少农田，在红军入川前，通、南、巴地区已形成“纵目田畴，已成黑化”的农村惨象。

在军阀官僚和地主阶级的统治下，人民生活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，尤其是北部大山区的人民，一般都过着“糠菜半年粮”的生活。年岁好时，打了的谷子除交租外，尚能吃三、四个月，剩下的时间吃包谷、红苕、洋芋、荞麦和野菜。至于油盐则更谈不上了，有的农民甚至终年吃不上一点油盐。遇到荒年，人民生活更苦，只有吃蕨根、葛根、树皮、神仙泥，甚至人吃人。当时南江

① 《国民公报》，民国22年8月12日。

② 西师所作“巴中恩阳区早谷乡乐园社典型调查表”。

③ 《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》第三辑，第50页。

④ “访巴中恩阳中学校长张佼记录”。

有一首民谣反映了这种情况："三月杂粮，三月糠，三月野菜，三月荒。"

在衣着方面，一般人民穿的都是襟襟吊吊，衣不蔽体，一件棉衣、一床棉絮往往几辈相传，十几岁的大姑娘，很多都没有裤子穿。在高山地区，冬天是异常寒冷的，但不少农民还穿着单薄的破衣。解放初，人民政府曾对通江平溪乡进行了调查，平溪乡第六村共有七十一户，四百一十人，共有旧棉袄、棉背心四十二件（三百六十八人缺棉衣），有破烂的棉絮一百二十九床，有蚊帐一十六床，木床九十五张，有冬不避寒、夏不避风雨的茅屋三百一十七间、瓦房四十间（包括寝室、厨房、农具室、贮藏室、畜圈在内）；贫农平均每十人有一件棉衣，四人一床破被絮，四十一人一床蚊帐，六个半人一张木床。可以想见，在一九三二年前，人民生活当更为悲惨。没有被子盖，农民就只有钻进包谷壳堆里去睡，俗称"冲壳子"。或者烤点柴火以保持体温，有一首民谣曾这样唱道：

爹也穷，妈也穷，
爹穷盖蓑衣，
妈穷盖斗篷，
细娃儿没盖的，
盖个吹火筒。

饥饿、疾病严重地吞噬着贫苦人民的生命，巴中就曾发生过因被迫种鸦片，发生饥荒而大批饿死，埋入万人坑的惨剧，因疾病死亡的也无法计算。

这些说不完的痛苦完全是军阀官僚和地主阶级一手造成的，川北人民无不咬牙切齿地痛恨这些吃人肉、喝人血的刽子手，不

断地起来反抗，随着矛盾的日益尖锐，最后必然要爆发激烈的阶级斗争来摧毁军阀、官僚和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。在红军入川前，川北地区已经“到处布满了干柴”，在红军入川后，这遍地的干柴就燃烧成了熊熊的烈火，把反动腐朽的旧政权烧成了灰烬。

（三）川北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

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，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。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和四川革命形势，亦转入了秘密的地下斗争，将革命重心转到农村，在农村搞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。同时，原先在上海、北京、武汉等城市工作的一些川籍党员，也先后回四川，这就更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，使四川的革命运动得到很大发展。

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首先在川东（梁山、万源、宣汉、开江等）一带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。一九二三年王维舟等同志便在宣汉清溪场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，团结了一批有志于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，在川东地区开展群众工作。

一九二六年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绥定（即达县）建立了。一九二七年中共川东党委的成立更加强了对川东革命运动的领导。“在党的指示下，大家分散在广大的农村，秘密组织农会，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军阀抓丁派款，斗争恶霸地主，从农会中选拔勇敢有觉悟的青年，组织小股游击队。白天生产，晚上集结，星星点点的火种很快蔓延到开江、梁平和大竹县一带。”①

① 《川东游击军的斗争》，《星火燎原》，第一集，第933页。

一九二八年春在群众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，在万源固军坝建立了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，李家骏同志担任了这支部队的指挥员。农民有了自己的武装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打土豪、捉恶霸、破仓分粮，革命形势猛烈发展，刘存厚的一个连也携枪起义投奔了游击军，使刘存厚和下川东十几县的军阀、豪绅地主大为震惊，急忙派兵镇压，游击军在击败了廖雨辰和王陵基（刘湘部，驻万源）匪军之后，人员便发展到一千多人。

一九三零年川东游击军由于执行了错误的“立三路线”，被调去围攻武汉。在途中被反革命军队包围于鄂西的房县、竹溪等地，苦战数日，因寡不敌众而失败。

一九三一年，党又在梁平的虎城场、太平场、金坝坝、猫儿寨一带组织了农民起义，建立了一支三千人的川东游击纵队，以李光华同志任纵队司令，王维舟同志任副司令兼前敌总指挥。这支游击纵队在沙河场一战，打垮了刘湘的两个师，后又多次粉碎了民团的“围剿”。就在这时，川东游击纵队又奉命包围武汉。王维舟等同志认为应该接受川东游击军东征的教训，在游击队未经过严格的训练和战争的锻炼时，远征是不利的，应派人再向省委请示。但有些同志盲目地执行“立三路线”，加上有“因胜而骄”的情绪，结果在石柱县与刘湘的一个师激战了三天三夜，弹尽粮绝，遭受到严重的损失，李光华同志也因负伤被俘殉难。在这次失败后，突围出来的同志转向有群众基础的梁（平）、达（县）、开（江）交界地区继续进行活动。党委总结了两次东征失败的教训，决定大力整编队伍，将现有的五百人分为三个支队，并且改变战略思想，采取对小股敌人的进犯则一网打尽，遇有强敌则用盘旋式的打圈子的战术，逐步发展革命力量。不久，中共梁达中心

县委成立了。省委指示中心县委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达县、宣汉、城口、万源和开江等地的群众组织，加强对游击军的领导。因此游击军又迅速发展起来。一九三二年八月，刘存厚又派其第二师一个团向宣汉进犯，被游击军击溃，并活捉敌团长一名。

一九三二年秋，川北南部爆发了“升保暴动”，给川东游击军的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同时红四方面军西征已接近川北。中共四川省委又指示梁达中心县委迅速动员一切力量，巩固和扩大游击军部队，配合红四方面军的胜利行动，猛烈扩大游击根据地。争取与主力红军会合。这时川东游击军为贯彻省委指示，积极活动于宣(汉)、达(县)、城(口)、万(源)和开江地区，牵制了刘湘、刘存厚的两个师，有力地配合了红军入川。

一九二八年，在川南，有郑佑之、余鸿文同志在自贡、宜宾一带组织的川南红军和陈范畴同志在南川组织的游击队。在荣县、犍为、彭水、富顺、纳溪、綦江、泸县、叙永等广大地区亦有游击队的活动。一九二九年秋收时，在党的领导下，荣县农民展开了斗争，他们在各乡召集农民大会，提出抗粮抗租反对军阀战争，反对地主剥削（反对加租另佃），增加工资，改善雇农生活待遇，反抗无故打骂虐待青年雇农，农民有集会武装的绝对自由等斗争纲领和要求，并有上千的农民在各场镇进行示威，邻县的农民也发动斗争来支援。当荣县驻军和团练下乡镇压时，农民发动了游击战争以对抗，许多乡镇全部为农民占据。他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，捣毁了税务机关，焚烧了田契和债据，有四万余农民参加的战斗，继续了八天。这次暴动震动了全川统治者，军阀刘文辉马上派两师人连夜奔赴荣县镇压。为了保存自己力量，党就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